

扬雄赋序的生成及其文学史意义

熊良智

内容提要 扬雄赋序的历史原貌值得再加审视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班固标明“扬雄自序”以别于他的赞述，划清了与“史辞”、史官改写的界限。《自序》为晚年所作，叙录主要著述缘由宗旨，其中“四赋”及其序文时间与叙事不衔接，应源于当年创作上奏留存的副本，综合了不同时代的新旧材料。《七略》记载“四赋”上奏时间有误，但有《汉书·成帝纪》佐证，可知确为扬雄元延年间写作，并奏闻朝廷。扬雄赋序开创了第一人称叙述、序赋一体的书写体式，前序后赋，代表了早期赋序生成的特点，杜笃《论都赋》序、班固《两都赋序》证明了这一传统。《七略》保留的“待诏臣雄上”的奏文，与扬雄《自序》互证，赋序并非晚年补作，则作者赋序西汉有作，而非“始于东京”，显示了扬雄赋序重要的文学史意义。

关键词 自序；早期赋序；书写生成；文学史

扬雄赋序自《文选》摘录、唐人论议，千百年来话题不断。论争焦点就是扬雄所作是否属于赋序？由此关联了一个文学史话题：“西汉赋亦未尝有序”，“自序之作，始于东京”^[1]。那么《汉书》载述扬雄“四赋”写作缘由主旨，为《文选》所录，是扬雄所作赋序，还是史官之辞？是晚年附加，还是《自序》与史辞的混杂？确认它的归属自是题中之义。我们知道，自序相对于他序，是作者角度的界定。奇怪的是，虽确认为扬雄自作，仍否定为自序，或称之为过渡。围绕着这个自序，学界有过许许多多的讨论，但总是含混不清，或者语焉不详。这个被称为“始于东京”的“自序”，似乎又不仅仅是从作者角度界定的概念。问题长期纠缠不清，影响了这一学术问题的历史定位。

一 扬雄赋序论辩的检讨

扬雄赋序的论争，由《文选》收录扬雄的《甘泉赋》《羽猎赋》《长杨赋》，分别摘录《汉书·扬雄传》中三段文字标为赋序引起。唐人张铉区别所谓《羽猎赋》序：“此赋有两序，一者史臣序，一者雄赋序也”^[2]。宋人王观国纠正说：“详其文，

第一序乃雄序也，第二序非序，乃雄赋也。”不过，他又有一种说法：“又《文选》载扬子云《解嘲》有序，扬子云《甘泉赋》有序，贾谊《鹏鸟赋》有序，祢正平《鹦鹉赋》有序，司马长卿《长门赋》有序，汉武帝《秋风辞》有序，刘子骏《移书责太常博士》有序。以上皆非序也，乃史辞也。昭明摘史辞以为序，误也。”^[3]这虽是批评萧统的失误，却与自己的论断发生了矛盾。因为他所说“第一序乃雄序也”，与《文选》录为《甘泉赋》序的文字，同样是摘录《汉书·扬雄传》的文字，归属却不同，一为“雄序”，一为“史辞”。判定“摘史辞以为序”，则是对“雄序”的否定。王观国的话虽然自相矛盾，却成为否定《文选》不加区别编排赋序的代表。而“摘史辞以为序”，也成了历史上赋序判断的分界线，以之论断赋序的文学史实：

周赋未尝有序……西汉赋亦未尝有序……
西汉赋七篇中，间有序者五篇：《甘泉》《长门》《羽猎》《长杨》《鹏鸟》，其题作序者，皆后人加之，故即录史传以著其所由作，非序也。自序之作，始于东京。^[4]

王芑孙这里的论断，不过是将“摘史辞以为序”换做“录史传以著其所由作”，以“自序”界定赋序

的性质,作了赋序“始于东京”的论断。应该说,赋序有了明确的界定,且划出起始年代,各家赋序的归属自然一清二楚。但是,这似乎并没有成为共识。以扬雄四赋为例,康熙时代的《历代赋汇》与上述两种都不同,所载《甘泉赋》《羽猎》《长扬赋》标为有序,而所增《河东赋》则无序,并未全部按照“摘史辞以为序”的标准。后来严可均《全汉文》则又补上《河东赋》“并序”^[5]。

到了现代,学界判定也各自不同。费振刚等《全汉赋校注》、龚克昌等《全汉赋评注》,以《汉书·扬雄传》所述四赋写作缘由、宗旨为序,而马积高主编《历代辞赋总汇》扬雄四赋皆无赋序。这样,不管是坚持《文选》的传统,还是反对“摘史辞以为序”,扬雄赋序的性质还是没有取得共识。

学界既以“自序”为赋序之名,而《汉书·扬雄传》已言“雄之自序”,颜师古尚指明:“自《法言》目之前,皆是雄本《自序》之文。”^[6]可其中“四赋”之序,学者们却众说纷纭,则扬雄赋序,始终夹杂在“自序”与赋序、史家之辞之间的灰色地带之中,引发了种种不同的意见。清人黄承吉认为:“《昭明文选》又以雄《自序》内所述作赋之由,分类冠于其各赋之首,读《文选》者更不察,而误认其赋与序为同时所作。”^[7]简宗梧也以时间差异判断:“原非当初献赋时就有的,所以算不上是真正的赋序。”^[8]“原非当初献赋时就有”,也当是作者本人的文字。可这一判断并未贯彻始终,又与“史辞”混为一谈:“我们现在在《文选》可看到贾谊的《吊屈原文》和《鹏鸟赋》,以及扬雄的《解嘲》和《甘泉赋》,都是后人把《汉书》的话抄来作序,而不是作者的原序。”^[9]日本学者谷口洋确定为扬雄附加:“扬雄《自序》尽管出于作者自身之手,但与后代的赋序不可同日而论。”“这些‘赋序’不是原来就有的,而是扬雄晚年编写《自序》时附上的。”^[10]还有学者认为多方合成:“扬雄诸赋序虽由本人撰写,却由他人附加为序,不能算自序。”^[11]也有学者支持证据:“至少从‘孝成帝’等用词上看,是经了过史家改写的。”^[12]这又成为《自序》与史辞的混杂。有的学者否定更彻底,认为扬雄作品之“序”,即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入诸子略儒家中的“扬雄所序三十八篇”,包括

“《太玄》十九,《法言》十三,《乐》四,《箴》二”,“数字相加,正好三十八篇”,“并无辞赋作品”,则扬雄根本就没有赋序。“《文选》中冠以‘并序’的《汉书》本传文字,也仅代表班固自己的意见。”^[13]还有从体例角度否定的:“《文选》所录诸题为序者,固是扬雄所作。但这些文字乃述生平行事之语,属于序传,不可视为赋序。”^[14]上述研究主要从“史家之辞”、附加为序、“自序”指涉等方面探讨了扬雄赋序的相关属性,但仍然难以确认扬雄赋序的真实面貌,说明扬雄赋序的文献形态确实存在着特殊的复杂性。

二 扬雄《自序》乃作者自撰之著作叙录

扬雄赋序的解读众说纷纭,值得再作清理。因为《文选》所载扬雄赋序,实见于《汉书·扬雄传》。所述《甘泉赋》序之“孝成帝”,当然不是扬雄写作《甘泉赋》的用语,也不是班固编撰《扬雄传》的史辞。《自序》本是晚年之作,“序中乃称成帝之谥,其序之作于赋后本明,而作序之时则在于王莽之世”^[15]。从《自序》所载《法言》目录,可以知道至少应在《法言》完成以后^[16]。至于据此而言“经过史家改写”,更值得商榷。班固“史辞”与扬雄《自序》之间,界限分明,内容各异。有的所述不同:扬雄自述待诏承明庭因“客”所荐,而班固所叙乃王音“召以为门下史”^[17],扬雄《自序》《太玄》“故有《首》……《告》十一篇”^[18],班固《汉志》“扬雄所序三十八篇”,自注:“《太玄》十九”^[19];有的扬雄未述,则班固补充:校书天禄阁,刘棻学作奇字,侯芭从居等等;还有班固“史辞”与扬雄《自序》互证。比如,扬雄作《解难》,针对“客有难《玄》太深,众人之不好”,班固则述:“刘歆亦尝观之。谓雄曰:‘空自苦,今学者有禄利,然尚不能明《易》,又如《玄》何?吾恐后人用覆瓿也。’”^[20]说明扬雄所针对的“客”难,正是刘歆等人。如果扬雄《自序》为史家改写,这些内容不如直接写入《自序》,何必另叙?特别是《解难》之“客”,就直述刘歆,何必后面补述?因而,班固于传中特言“雄之《自

序”，就在于区分“史辞”与扬雄《自序》的界限，所以《自序》为扬雄自作，绝非史家改写。

我们知道扬雄《自序》除开头一段家世家境及人生态度的叙述，基本是以著作为中心的叙录，记录作品，罗列篇目。各篇构成小序，叙说作品写作原委、宗旨。从交代《反骚》及其他骚体作品创作开始，再述《甘泉赋》《河东赋》《校猎赋》《长杨赋》写作缘由，陈列“四赋”内容。交代“哀帝时”“方草《太玄》”后，有人嘲笑《太玄》的创作，不过是仕途“拓落”，“以玄尚白”。扬雄又写《解嘲》，表明守道全身的人生态度。紧接着补充《太玄》写作的原因，因为“赋劝而不止”，“辍不复为”，“而大潭思浑天”，阐明《太玄》写作的思想、设计安排，全书的分卷、篇目“十一篇”。针对客难《太玄》深奥，著《解难》回应。采用假设问答的方式，以翠虬绛螭、日月、泰山的超越，特别是宓戏、文王、孔子、老子的著述等作类比，表明“闕言崇议、幽微之途，盖难与览者同也”，“不可齐于庸人之听”^[21]。因而《太玄》的道理不为众人所知，正是它的可“贵”。最后叙说《法言》一书写作，介绍全书十三卷条目及各篇主旨。比如：“孝莫大于宁亲，宁亲莫大于宁神，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，撰《孝至》第十三。”^[22]其后，班固以“雄之《自序》云尔”总括，申言《自序》宗旨，概括扬雄人生追求：

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，以为经莫大于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；传莫大于《论语》，作《法言》；史篇莫善于《仓颉》，作《训纂》；箴莫善于《虞箴》，作《州箴》；赋莫深于《离骚》，反而广之；辞莫丽于相如，作四赋。皆斟酌其本，相与放依而驰骋云。^[23]

其实，历史上对扬雄《自序》特点的认识并不充分。刘知几以为作者自叙源流，则屈原《离骚》为始，“至马迁，又征三闾之故事，放〔仿〕文园之近作，模楷二家，勒成一卷。于是扬雄遵其旧辙，班固酌其余波”^[24]。这里的放（仿）作与“旧辙”“余波”，乃言其间学术传统：“叙录之体，源于书叙，刘向所作书录，体制略如列传，与司马迁、扬雄《自叙》大抵相同。”^[25]又“迁《自序》于所作《太史公书》七十篇，皆有小序，雄《自序》于平生著作甚详，亦载《法言》小序”^[26]，

则总为叙录，篇有小序。不过扬雄《自序》并非司马迁《自序》以一生事迹为线索，所以余嘉锡说“雄《自序》”，“皆仿《诗》《书》之例”^[27]。不过，扬雄《法言》却说“《书》序不如《易》”序：

或曰：“《易》损其一也，虽蠢知阙焉。至《书》之不备过半矣，而习者不知。惜乎，《书》序之不如《易》也。”曰：“彼数也，可数焉，故也。如《书》序，虽孔子末如之何矣。”^[28]

此说《易》序，即《易》“《序卦》传”^[29]。《书》序不如《易》序，在于《易》之六十四卦序次之“数”“可数也”。李轨注：“《书》序虽存，独不如《易》之可推寻。”^[30]我们看《易·序卦》，从“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”，“故受之以屯”代表“物之始生”，“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蒙。《蒙》者，蒙也，物之稚也。物稚不可不养也，故受之以需。《需》者，饮食之道也”^[31]。一直叙述到《易》的最后一卦《未济》，逐次讲述《易》经六十四卦前后相因相成的结构关系，所以孔颖达解释说：“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，故谓之《序卦》。”^[32]因而“《易》损其一，虽蠢知阙”，可借助《序卦》所述六十四卦相成关系，推寻六十四卦的整体构成。而《书》序各篇分题，并无前后相成关联，所以《书》亡，或有《书》序，“虽孔子末如之何”，也无法推寻出亡书的篇目内容，这或是扬雄讨论“《书》序不如《易》”的用意。他的《自序》如《易》序，各篇写作原委前后相关。比如，《自序》最后由《太玄》叙到《法言》，就是由当世的责难，联系到历史上的诸子，讲《法言》写作的缘起：

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，大氏诋訾圣人，即为怪迂析辩，诡辞以挠世事。虽小辩终破大道，而或众使溺于所闻，而不自知其非也。……故人时有问雄者，常用法应之，撰以为十三卷。象《论语》，号曰《法言》。^[33]

《法言》批评诸子，“吾见诸子之小礼乐也，不见圣人之小礼乐也”^[34]，直斥诸家：“庄、杨荡而不法，墨、晏俭而废礼，申、韩险而无化，邹衍迂而不信。”^[35]又批评诸子“诋訾圣人”“终破大道”，误会圣人著述“立言”精神，就联系着自己的现实遭遇。他著《太玄》，名之为“经”，有人“讥以为

雄非圣人而作经，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”^[36]。扬雄宣称《太玄》“其事则述，其书则作”^[37]，并用经学发展的历史，证明有继承，有创作，阐明圣人著述的精神：

或曰：“经可损益与？”曰：“《易》始八卦，而文王六十四，其益可知也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春秋》，或因或作，而成于仲尼，其益可知也。

故夫道非天然，应时而造者，损益可知也。”^[38]“应时而造”，阐述“经”书的损益，这与经学时代的章句之徒墨守陈规不同。张扬学术创新，正是扬雄敢说《太玄》“其书则作”的历史依据。有人嘲笑他的《太玄》“以玄尚白”，“大深，众人之不好”，“空自苦”，“恐后人覆瓿也”^[39]。扬雄在《解嘲》《解难》中的回应，《法言》中有同样的意旨：

或问：“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天俄而可度，则其覆物也浅矣；地俄而可测，则其载物也薄矣。大哉！天地之为万物郭，五经之为众说郭。”^[40]

天地、五经的博大弘深，就不易知，不也就是对责难《太玄》“大深”的回应？可以看到《法言》写作与《太玄》前后关联的思想脉络。

至于《自序》未得叙录的著作，有《方言》《剧秦美新》《元后诔》等，这是《自序》写作时尚未完成，或尚未写作。而《训纂》《州箴》不叙，或与扬雄学术思想有关。《自序》多述扬雄亲身经历及其密切关注的社会人生基本问题。《反骚》为代表的骚体作品，以屈原遭遇投江自沉为焦点，是士人有关生与死的思考；上奏汉成帝四篇大赋讽喻，是君王德行与百姓民生的关系；《解嘲》讨论怎样对待人生的得与失，《解难》与客论辩著书的难易，表达作者著书立言的思想倾向：“闷言崇议，幽微之途，盖难与览者同也”^[41]。《太玄》“大潭思浑天”，是天人之间的课题，所谓“玄也者，天道也，地道也，人道也。兼三道而天名之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妻之道”^[42]。而《法言》已明言诸子、圣人、小辩、大道，等等。《自序》作品多有创意，《太玄》一书，扬雄已宣称“其事则述，其书则作”。辞赋虽学相如“常拟之以为式”，但扬雄在题材、体式、风格多有突破、创新^[43]。《法言》似学《论语》语录对话。不过《论语》中孔子所言，或与弟子对答，皆

真实的历史人物活动、言语行事，《法言》则基本是虚拟对话。而《训纂》或不见创意，因汉平帝元始年间征召编撰。这有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证明：“至元始中，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，各令记字于庭中。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《训纂篇》。顺续《苍颉》，又易《苍颉》中重复之字，凡八十九章。”^[44]

由此不难看出，《自序》晚年叙录著作缘由、宗旨，皆扬雄自身现实经历写作的思想认识，而非“史家之辞”、后世附加。其间相互关联，意在显示各篇创作的前因后果。赋与赋序更有可以确认的写作、上奏的时间与转换的节点。《甘泉赋》后，感于当初汉成帝甘泉宫祭祀泰一的奢靡，以及宠幸赵飞燕以求继嗣的荒谬，“欲谏则非时，欲默则不能已”，“又言屏玉女，却虚妃，以微戒斋肃之事”^[45]，虽仍言《甘泉赋》之讽谏，却与赋序前后界限分明，绝不混淆。又《长杨赋》序言“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”，“农民不得收敛”“以风”，赋中就有强烈的谴责：“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”，“扰于农民三月有余”，“岂为民乎哉”？如此愤激，写实揭露。可有学者认为，序中“所述作赋之意，乃皆于新莽之世”，“饰为讽谏”，“以序辞分属于各赋之首尾，使序与赋混淆”^[46]，似乎并不符合扬雄赋序写作生成的事实。

三 扬雄赋序的写作与生成

汉代有著作叙录的学术传统：“及刘向奉诏校书，为之著录。考其《战国策》录，自称‘叙曰’。《隋志》亦云‘每一书就，向辄撰为一录，叙而奏之’，知录即诸书之叙”^[47]，“序所以为作者之意”^[48]。扬雄赋篇亦“叙而奏之”：

孝成帝时，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。上方郊祠甘泉泰畤、汾阴后土，以求继嗣，召雄待诏承明之庭。正月，从上甘泉，还，奏《甘泉赋》以风。^[49]

明年，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。秋，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，西自褒斜，东至弘农，南驱汉中，张罗网置罟，捕熊黑豪猪、虎豹犴獾、狐菟麋鹿，载以槛车，输长杨射熊馆。以网为周陆，（从）〔纵〕禽兽其中，令胡人手搏之，自取其获。上亲临观焉。是时，农民不得收

敛。雄从至射熊馆，还，上《长杨赋》，聊因笔墨之成文章，故藉翰林以为主人，子墨为客卿以风。^[50]

两段文字分别叙说《甘泉赋》《长杨赋》写作的时间、背景、事由及宗旨，作为赋序，我们应该承认《文选》当时选录的道理。但这个问题引发的种种质疑、非议，甚至否定，实是多有不明扬雄自序晚年写成的原因。“孝成帝”，绝不是扬雄作《甘泉赋》的称谓，“明年”自然不是《长杨赋》当年上奏的表述。这正好透露了扬雄《自序》构成的特点，其中绾合了不同时代的新旧材料。

首先，扬雄《自序》在《法言》完成后写成，“孝成帝”“待诏承明之庭”乃写《自序》时的追述。“明年”，是承续前一年的用语，表明《长杨赋》写作在《甘泉赋》等三赋写作后的第二年，这里有新旧材料组合的跳脱痕迹。因为，据班固叙扬雄“年四十余，自蜀来至游京师”，“年七十一，天凤五年卒”，则扬雄生于甘露元年（前53年），游京师应为元延元年（前12年）四十二岁，^[51]这是“待诏承明之庭”开始的时间。但“待诏承明之庭”以事叙年，包括元延元年、元延二年。尔后叙述的《甘泉赋》《河东赋》《校猎赋》只系以“正月”“三月”“十二月”，不明当属元年，还是二年？检《汉书·成帝纪》载述，可知三赋皆作于元延二年，自非“待诏承明庭”同年时间的叙述。所以“正月”“三月”“十二月”，为元延二年当时作赋的叙述，后来移置编入《自序》，出现了前后时间不衔接的现象。

其次，扬雄赋作上奏朝廷，《七略》记载可证：“《甘泉赋》，永始三年正月，待诏臣雄上”。“《羽猎赋》，永始三年十二月上”。“《长杨赋》，绥和元年上”^[52]。《汉志·诗赋略》陆贾赋最后一家“扬雄赋十二篇”，班固自注“入扬雄八篇”^[53]，可以证实《七略》收录四赋的记载。只是《七略》所载奏赋时间有误，因为《汉书·成帝纪》永始三年并无祭祀甘泉、校猎记载，绥和元年成帝也未亲临长杨宫射熊馆。且与班固所述扬雄“四十余”至游京师时间不合，自无扬雄作赋上奏之事，所以李善说“《七略》误也”，“又疑《七略》误”^[54]。然而《七略》的记载从何而来？只能根据扬雄自己的奏文，才会有“待诏臣雄上”这种在场身份的自述。其中

“永始三年”时间不确，“《甘泉赋》，正月，待诏臣雄上”，应是扬雄元延二年奏文的摘录。“待诏臣”是元延元年、元延二年扬雄“待诏承明庭”的身份。根据班固记载：“雄待诏岁余，奏《羽猎赋》，除为郎，给事黄门。”^[55]“其十二月羽猎”在元延二年，后则非待诏之臣。而作为奏文，原文必有上奏事由、主旨，可见扬雄《自序》记录：“正月，从上甘泉，还，奏《甘泉赋》以风。”文字虽然简短，所奏事由，时间、作品、主旨，清楚明确，表明“所以为作者之意”。《七略》还分别记载了扬雄不同时间上奏的《羽猎赋》《长杨赋》。《七略》的一赋一叙，分条记录，依据仍然是扬雄的奏文。因为跟随汉成帝出行的时间不同、事由不同，写作的内容不同，所以《羽猎赋》《长杨赋》上奏的事由、主旨也就不一样。这都保留在扬雄《自序》中：“其十二月羽猎……故聊因《校猎赋》以风。”^[56]《长杨赋》则“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……故藉翰林以为主人，子墨为客卿以风”^[57]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就直接将《长杨赋序》作为汉成帝元延三年“大夸胡人以多禽兽”的大事记^[58]；《河东赋》有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述的扬雄赋，可以佐证《七略》中记载，事由、主旨则是“其三月……还，上《河东赋》以劝”^[59]。扬雄这些奏文的叙说，都是有关作赋的事由与主旨，显现的就是一般赋序的功能特性。而“四赋”序中，记述每一次跟随汉成帝的出行，无论是祭祀，还是田猎，基本上都能得到《汉书·成帝纪》的印证。而赋的写作都是“还”则上奏，所以，可以确认“四赋”及其序文的写作与上奏时间的一致，完成在元延二、三年间。

再次，扬雄《自序》赋序移置于写作四赋留存的副本。秦汉时期的官府、文人中，已出现了文书别行、留存文书、文稿副本的现象。睡虎地秦简《语书》载：“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，南郡守腾谓县、道啬夫……以令、丞闻。以次传；别书江陵布，以邮行。”^[60]这是秦王政二十年四月，南郡守腾颁发属下各县的一份文告。其中“别书江陵布”，就是“本文书另录一份，在江陵公布”^[61]。这里的“别书”，就是文告的另一个文本。又《居延新简——甲渠候官》载：“五月戊辰，丞相光下少府、大鸿胪、京兆尹、定口相承书从事下当用

者。京兆尹以口次传，别书相报，不报者重追之，书到言。”^[62]这是丞相下发少府、京兆尹等官府的文书，京兆尹又“别书”一式多份，按邮路逐次传递。文人著述留存副本，有司马迁的《太史公书》。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“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”，《索隐》解释“言正本藏之书府，副本留京师”^[63]。而副本又用于著作编撰，刘向《别录》最有代表性。余嘉锡解释：“向所奏上之篇目旨意，载在本书者谓之录，編集别行者谓之《别录》”^[64]。可知今所见《别录》，就是用奏书副本编辑的另一种文本，阮孝绪称为“别集众录”^[65]。

那么，扬雄“四赋”元延年间既已上奏，而《自序》在王莽时代，所录赋文从何而来？应该就是创作留存的副本。扬雄作赋秉承诏命，但遵循“诗人之赋”宗旨：“赋者将为风也”。而他的思想方法讲求征验，主张：“君子之言，幽必有验乎明，远必有验乎近，大必有验乎小，微必有验乎著。无验而言之谓妄。君子妄乎？”^[66]因此，特别关注辞赋讽谕的社会效果，“劝而不止”，则“辍不复为”。所以留副本，记载赋作事由、宗旨，以求验证，也得以“文章成名于后世”。因为是留存的副本材料的直接移入，《自序》才会发生月份记述的作赋时间，与“待诏承明之庭”的以事叙年不相衔接的跳脱现象。

再看赋序与赋文的书写方式、生成关系，决定了扬雄赋序与赋文的写作与史家之辞不同。《文选》中贾谊《吊屈原文》与《鵩鸟赋》的两篇序文，都是改编的司马迁《史记》的“史家之辞”。序辞以第三人称叙述贾谊写作的背景、缘由、主旨：“贾生”“及渡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。其辞曰”^[67]；“有鵩飞入贾生舍”，“贾生既以适（谪）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自以为寿不得长，伤悼之，乃为赋以自广，其辞曰”^[68]。不管是司马迁还是《文选》的编者，赋序与赋都不是同一作者的写作，时间跨度几十年、几百年，序、赋之间结构松散灵活，写作也就不受时间的限制。

但是，扬雄的赋序是第一人称叙述、序赋一体的结构书写方式。他作赋奏闻朝廷，“正月，从上甘泉，还，奏《甘泉赋》以风”；“雄以为临川羡鱼，不如归而结网。还，上《河东赋》以劝”^[69]；《校猎赋》序“雄从”，“故聊因《校猎赋》以

风”^[70]。一序一赋，前序后赋，一体为文。可以看出，这不仅仅是一种书写方式，而且是一种创作生成的结构关系。序中的事由、主旨，是触发写作的动因，而作品的完成，就是赋、序互动的过程。所以，扬雄的赋序不会是后来的附加，而是与赋同时完成的。这是作者赋序共同的特征，也是从奏文演化中产生的早期作者赋序的特点。我们看杜笃《论都》，序云“窃见司马相如、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，臣诚慕之。伏作书一篇，名曰《论都》，谨并封奏如左”^[71]。奏文说明了《论都赋》的写作缘由、宗旨，后面紧接上呈的《论都赋》，奏文成为《论都赋》的引言。特别是“谨并封奏如左”的过渡，将赋、序连接一体。又班固《两都赋序》，上奏朝廷叙说作赋事由、宗旨：“臣窃见海内清平，朝廷无事，京师修宫室，浚城隍而起苑囿，以备制度。西土耆老，感怀怨思，冀上之眷顾，而盛称长安旧制，有陋洛邑之议。故臣作《两都赋》，以极众人之所眩曜，折以今之法度。辞曰……”^[72]序后亦是上奏的作品《两都赋》。后世的创作也是如此。唐代李庚的《两都赋》、宋人周邦彦的《汴都赋》、明朝金幼孜的《大明一统赋》，皆为上奏朝廷的作品，《历代赋汇》标明“有序”，都是他们献赋的奏文，以臣言作赋事由，再引入赋文。读周邦彦《汴都赋》，序云“臣邦彦顿首”“谨拜手稽首献赋曰”^[73]，引出全篇赋文，都反映了基本相同的序、赋一体的结构生成方式。

四 扬雄赋序创作的意义

扬雄赋序的创作及其《七略》记载，业已证明扬雄在元延年间跟随成帝出行，上奏的作赋事由及宗旨，已标志着作者赋序的产生，证明王芑孙“西汉亦未尝有序”说法的失误。这是他忽略班固《汉书·扬雄传》中明确宣称“扬雄自序”的意义，简单地视之为“史家之辞”的误判。还有学者并未细致分辨扬雄“自序”乃晚年所作，而以“汉成帝”谥号否定扬雄赋序。他们看到了扬雄赋序的存在，却以为自序时附加。或因存于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，判为史家改写，或称为“过渡”，都因为忽略《七略》的记载，未能清楚认识扬雄赋序书写的生成方

式。澄清这一点,或可消除种种疑虑,认识西汉时代扬雄赋序写作的事实。

扬雄赋序反映了早期赋序生成的特点,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说法是“自序之作,始于东京”。但是,这些“始于东京”的“自序”的代表性作品,有杜笃《论都赋》序、班固《两都赋》序。可它们的书写生成方式,都带了扬雄赋序一样创作生成的轨迹。同扬雄的赋序一样,《论都赋》序、《两都赋》序都是上奏朝廷的文书,还都联系着作者的现实经历。扬雄随汉成帝出行祭祀、田猎,引发讽喻,杜笃因东汉初定都,上书光武,班固由于汉章帝建初七年“西巡狩,幸长安”,“西土耆老”“盛称长安旧制,有陋洛邑之议”,为“极众人之所眩曜”。内容都在说明作赋的缘由、主旨,其间的渊源,杜笃有说:“司马相如、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,臣诚慕之。伏作书一篇,名曰《论都》”^[74]。史书有司马相如上奏之赋,却未见奏赋之文,扬雄赋序就成了现存最早的代表,所以自序“始于东京”的说法值得商榷。当然,勿容讳言,扬雄赋序见于《汉书·扬雄传》,虽有赋序之实,并无赋序之名。杜笃《论都赋》序也说“伏作书一篇,名曰《论都》”^[75],班固言“作《两都赋》”,上奏是否以《两都赋序》称名,不见确证。冯衍有《显志赋》,序云“乃作赋自厉,命其篇曰《显志》”^[76],作者皆不名序,《历代赋汇》则题《论都》《显志》有序^[77]。或许,这就是赋序的最初形态,也是一般文体生成发展中的特点。

扬雄赋序开创了作者赋序第一人称叙述、序赋一体的结构生成体式。杜笃《论都赋》序、班固《两都赋》序上奏朝廷,同扬雄赋序一样称之为“臣”。冯衍《显志赋》序自称“冯子”“作赋自励”,马融《长笛赋》序以“融”自述,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序则以“予”言。更多的是以“余”的口吻叙述经历、见闻、背景,引发作赋动机,而生成作品。这也成为区分作者赋序与他序的标志。《文选》有《长门赋序》其中“孝武皇帝陈皇后”一语已非司马相如能言,云“而相如为文,以悟主上,皇后复得幸”^[78],自然是第三人称的他者叙述。特别是同名《三都赋序》的赋序,左思自作,则云“余既思摹《二京》而赋《三都》”^[79]。皇甫

谧为左思《三都赋》作序,则言“作者又因客之辞,正之以魏都,折之以王道”^[80]。又同名《汴都赋序》,周邦彦因其自作,则云“臣邦彦”“谨拜手稽首献赋”^[81],而晁补之为关景晖《汴都赋》作序,则言“关景晖初奏《汴都赋》以讽”,“国子监教授晁补之序其意”^[82]。

作者赋序所叙作赋事由,因亲身经历,耳闻目睹,成为考察作品创作的重要历史线索,有的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。有了扬雄赋序上奏的时间与内容,人们得以纠正《七略》记录时间的失误,而《资治通鉴》直接将《长杨赋序》系于成帝元延三年作为“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”,亲临射熊馆观猎的历史记录。班固《两都赋》序言“西土耆老,咸怀怨思,冀上之眷顾”,反映的就是汉章帝建初七年“西巡狩,幸长安”,有人希望章帝迁都长安的大事件,为此成为论证班固写作《两都赋》时间的重要依据。^[83]扬雄赋序特点,有确切的时间记录。虽然只有月份,但人们以此参照相关材料为扬雄编写年谱,考察他“四十余”来京师,以及王音召为门下史的史实。有了元延二年作《甘泉赋》的坐标,则元延元年四十二岁(前12年)来京师,而王音永始二年(前15年)已卒,推测班固说法有误。^[84]后世不少赋序也有时间标志,人们不仅用于作家作品编年,也作为文学史料考察研究相关问题。比如,赵幼文《曹植集校注》撰《曹植年表》,分别用曹丕《感离赋序》《登台赋序》《临涡赋序》所述“建安十六年”、十七年、十八年作赋,曹植皆同有赋作,或同行,记述曹植经历、创作^[85]。

可见,只有弄清楚扬雄赋序的真实面貌,才能认识到它在文学史中的重要意义。

[1][4] 王芑孙:《读赋卮言》,《丛书集成》(三编),第61册,第595—596页,第595—596页,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。

[2][52][72][78][79][80] 萧统编,吕延济等注:《六臣注文选》,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,第137页,第117页、第143页,第22页,第240页,第77页,第704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。

[3] 王观国《学林》卷七《古赋序》,《四库全书》第851册,第168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
[5][71] 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第404页，第626页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

[6][17][18][19][20][21][22][23][33][36][39][41][44][45][49][50][53][55][56][57][59][69][70] 王先谦：《汉书补注》，第1512页，第1512页，第1509页，第881页，第1512页，第1510页，第1512页，第1512页，第1511页，第1513页，第1512页，第1510页，第878页，第1494页，第1489页，第1502页，第892页，第1512页，第1496—1497页，第1502页，第1494页，第1494页，第1496—1497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[7][15][46] 黄承吉：《梦陔堂文说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503册，第61页，第62页，第62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8][9] 简宗梧：《汉赋史论》，第154—155页，第54页，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。

[10] 谷口洋：《试论两汉赋序的不同性质》，《济南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2期。

[11] 马黎丽：《赋序的生成与文体特征的确立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8年第1期。

[12] 马庆洲：《汉赋“序”考辨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3期。

[13] 陶成涛：《扬雄四赋作年新论》，《西北大学学报》2017年第6期。

[14] 赵厚均：《〈文选〉赋序论争与两汉赋辨析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19年第8期。

[16] 汤炳正据《法言·孝至》“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”，定《法言》成书于始建国元年（公元9年）。《语言之起源》，第360页，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。

[24] 刘知几著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25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
[25][26][27][47][64] 余嘉锡：《目录学发微》，第34页，第19页，第19页，第19页，第16页，巴蜀书社1991年版。

[28][30][34][35][37][38][40][66] 汪荣宝著，陈仲夫点校：《法言义疏》，第147页，第147页，第122页，第280页，第164页，第144页，第157页，第159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[29] 俞樾：《诸子评议》，第685页，中华书局1954年版。

[31][32] 王弼、韩康伯注，孔颖达疏：《周易正义》，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95页，第95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[42] 郑万耕：《太玄校释》，第349页，中华书局2014年版。

[43] 参王以宪《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》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，1985年第1期；许结《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想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88年第1期；简宗梧《从扬雄的模拟与开创看赋的发展与影响》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，王青《扬雄评传》第六章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熊良智《扬雄的文学思想与辞赋书写》，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，2019年第6期。

[48] 孔安国：《古文尚书序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16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[51][84] 汤炳正：《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杨雄年谱》，《语言之起源》，第324页—325页。

[54] 萧统编，吕延济等注：《六臣注文选》，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，第117页、第143页。后来学界多有考证《七略》之误，参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第1502页。

[58] 司马光编著，胡三省音注：《资治通鉴》，第1038—1039页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。

[60][61]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释文注释》，第13页，第15页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。

[62]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《居延新简·甲渠候官》（上），第57页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。

[63][67][68]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3320—3321页，第2492页，第2496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[65] 阮孝绪：《七录序》，任莉莉《七录辑证》，第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。

[71][74][75][76] 王先谦：《后汉书集解》，第909页，第909页，第909页，第353页。

[73][81][82] 曾枣庄、刘琳：《全宋文》，第128册，第216页，第128册，第216页；第126册，第110页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。

[77] 陈元龙：《历代赋汇》（影印本），第136页、第561页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。

[83] 赵逵夫《〈两都赋〉的创作背景、体制及影响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3年第1期；陈君《〈两都赋〉的创作与东汉前期的政治趋向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10年第2期。

[85] 赵幼文：《曹植集校注》，附录三《曹植年表》，第569—570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。

[作者单位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]

责任编辑：李超